

如何进行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

□赵敏俐

如何进行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在我看来当下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较深的认识。

第一,总结近百年的历史实践,重新认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个什么关系?我认为它们是一种相承相续的关系。不管我们是否喜欢,传统文化都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原初基因,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永远也脱离不了。回顾100多年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被当作批判对象的,是落后文化的代名词。反对落后的传统文化,学习先进的西方文化,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后来进一步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要“彻底砸烂旧世界”,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扫地出门。但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彻底砸烂旧世界”的“革命行动”,所采用的却是一种更为野蛮落后的暴力手段进行的。中华大地由此而变成一片残破的瓦砾场,缺少了人文精神的文化荒漠。经过一个世纪的实践之后,我们今天已经重新认识到,现代化的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流淌在我们身上的民族血脉,是心灵的归宿,是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生活经验的总结,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立足于中华大地而生成的文明形态。中国人所生存的空间是亚洲东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方式都在这块土地上养成,我们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此。因此,对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并不仅仅是好坏优劣的价值判断,首先要弄清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才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第二,从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认识传统文化的优点与不足。回顾100多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来进行的。百年之前,面对着西方文化的强势涌入和中国社会的落后,自励自强的中国人为了振兴中华而进行文化反省,对传统文化进行激烈的批判自有其合理性。如今重提这一话题,时代的语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点得以更多的显现。一方面是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日渐加深,逐渐发现它原来并不完满。中华民族的现代化离不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这一观点正在成为国人的共识。可以说,只有到了今天,我们才算是真正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了什么叫“中国文化本位”。既然如此,我们自然要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由百年前的批判为主转为今天的继承为主,我们需要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一面并努力将其弘扬,使之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一重要一元,为全人类的和平作出贡献。但与此同时,我们仍然需要时时反省,客观地看到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缺点,我们既不能自卑,也不能妄自尊大。因此,平等交流,和平对话,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应该是我们在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自然也是我们对待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

第三,杜绝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立足于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近百年我们对传统文化之所以持更多的批判态度,重要的一点是源自于国人急于现代化的迫切心情。因而我们很自然地以“有用”或者“无用”的选择来对待它,而缺少科学的深入的研究。不错,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但是须要杜绝狭隘的实用功利主义。中华传统文化绵长久远,博大精深,瑕瑜互现,杂糅并陈。如何从中提取出符合中华民族现代文化建设的东西,符合世界文化发展需要的东西,是一项艰苦复杂的研究过程。以儒家思想而言,孔子的“仁”学思想与“礼”学思想在孟子与荀子那里就有了不同的发展,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与先秦儒学有着很大的不同。宋明时代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各有特点。要把这些转化成现代文化发展中的有机要素,既需要回归历史进行思考的反本开新,也需要从现代立场对其进行新的加工提炼。因而,警惕将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庸俗化和功利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系統研究,以求真和求实的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对其进行现代化阐释的重要基础工作。

传统诗学资源的现代转换

□赵思运

姜耕玉教授的新著《新诗与汉语智慧》(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对百年新诗进行反思,聚焦于汉语诗性智慧,并从现代性体验中,从古汉诗的贯通与转换中,展开具体深入的考察与理论探索,确系切中肯綮之力作。

《新诗与汉语智慧》充满了深切的历史反思精神。“五四”文学革命以后,新诗迈入了现代化进程,但是,新诗的现代性造成了传统汉语诗性的隔绝与诗学传统的断裂,以抛弃汉语的诗性智慧为代价,教训惨重。姜耕玉系统地辩证地考察了新诗的猝然发生造成的中国诗歌自由精神的张扬与汉语诗意的流失。回眸百年新诗史,他一方面看到了“先锋”与“新潮”的嬗变所具有的“破坏性的魅力”,另一方面又窥视到所谓的“先锋”与“新潮”深陷“革命惯性”之中的文化虚无实质,呼吁寻找汉语诗学的母语之根,发掘汉语代代相承的诗性基因。姜耕玉指出,第三代诗群进行学理性判断,不能局限于“后现代语境”画地为牢,而要面向新诗潮和西方现代主义两种实际,进行考察。他高度肯定了于坚诗作《长安行》在新诗的现代性和汉语性的双重递增意义,以及在彰显出的于坚的诗学雄心:“真正自在地回到汉语,使我们的诗歌能够字字不可无一,句不可移、篇不可译,以实现汉语作为独一无二的光辉语言的使命”(于坚《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遗憾的是,自称“汉语崇拜狂”的于坚,却从《长安行》后退到了“隐喻”后退”的立场。姜耕玉尖锐地指出:于坚对“破坏性魅力”的迷恋,实乃80年代极端美学的复活,这种“回到能指的表面”的歧途,将会导致汉语诗性及精神生命的消失。姜耕玉还以台湾新诗转型作为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台湾历时20年的诗学论战,在“离心力”与“向心力”的论争中,创世纪诗社凝练出“新民族之诗型”的观念,深深植根于大中华文化心理结构的民族性和人道主义的世界性,倡导现代诗的先锋性与民族性相结合。台湾的新诗史为姜耕玉的论证提供了坚实的论据。

姜耕玉将新诗语言本体的建设性探索置于诗学话语的核心位置。他向诗歌本体研究的突进,经历了具有递进关系的四个层次:诗歌工具论—>诗歌精神的自足性—>诗歌文

本的自足性—>汉语母语的诗性智慧与诗性结构。诗歌本体意识的觉醒第一步是,使诗歌从政治、宗教、文化的工具论的异化中摆脱出来。当一般学者还停留在打破诗歌工具论的思想解放层面而呼唤诗歌精神独立之时,姜耕玉已经以破竹之势突入了诗歌文体内部,窥探到诗歌最具魅力的花蕊绽放的奥秘。在《新诗汉语诗性传统失落考察》一文中,他谈到:“90年代流行的诗本体理论,其立论根据,大致着眼于诗的意义或本质。……将诗本体与诗体形式剥离开来,以意义本体代替形式本体的倾向,实质上是因袭20世纪初诗体革命负面表现:把自由体误读为‘无拘无束’,‘散漫无纪’。”姜耕玉的新诗形式研究出发点是新诗的汉语本体。他批评了历史上对新诗形式探讨的误区,比如:“新格律”概念对新诗自由体的汉语音节的遮蔽,“新格律”试验中模仿外国诗倾向,新诗“民族形式”的简单化倾向。他清醒地意识到新诗的革命性对自身的严重遮蔽,导致艺术粗糙、散漫无纪,诗美流失。诗歌的散文化和译诗化等倾向,侵蚀了诗歌文体的内在自足性,导致诗歌文类的退化。所以,他孜孜以求于立足于汉语诗性智慧的新诗形式建构。他倡导西方现代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融化”,探寻“化古与化欧”的创造性转化的内在机制。他秉持着解构(创新)与结构(建设)的辩证关系,做到母语批评语境的民族性与世界诗歌语境的现代性相结合。而激活汉语诗性智慧,融入现代生命体验,迥异于以往革命为导向的主流诗学传统。姜耕玉一方面接续了东南大学新诗谱系中的鲜明的文体建构意识,又扬弃了他们过度西化的偏颇之处。姜耕玉以貌似保守的态度,彰显出尖锐的问题意识和厚实的建构能力,其实走在现代汉诗的前途。21世纪文化背景下,姜耕玉重提新诗的汉语诗性智慧和汉语诗性传统,对传统诗学资源进行现代转换,富有创见地在汉语性与现代性之间架设了一座诗学桥梁。姜耕玉非常欣赏覃子豪《追求》中的境界:“大海中的落日/悲壮得像英雄的感叹/一颗心追过去/向遥远的天边”。姜耕玉孜孜不倦地对新诗汉语智慧中思考,不正是在中西诗歌交汇的“大海”中打捞汉语诗性“落日”吗?

经典重探对当前创作的挑战 and 意义

□马建辉

“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不想写出经典作品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经典呢?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创造经典的鼎盛时期,而正是由于希腊、罗马古代经典的重新发现和探究,才有了划时代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循史为例,创造经典首先离不开对于传统经典的弘扬和学习,离不开对经典精神的敬畏和尊崇,离不开对于经典意义和价值的重新探究和挖掘。

经典时刻在影响着作家,但是如果只在一些当代作品中寻找经典的影子或者作家摹写的痕迹,如指出某个文本在具体情节和写作手法上跟经典类似或相像(这几乎是一种近于浅薄或粗俗的研究法),那也不足以阐明经典所产生意义,还不足以开掘出经典爆发性或强力影响一个新时期的巨大能量。

经典总是常读常新的。但经典也有自己的命运,在不同时代体现出的价值并不相同。经典也在为自己的存续不断地开辟道路。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创造新经典的形式,实现了古代经典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在现当代中国,有三个生产经典的时期:一是“五四”时期,这是西方经典在中国实现其价值的时期,西方经典开启了一场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新文化启蒙运动。鲁、郭、茅、巴、老、曹的们学生产生成为中国现代经典的重要奠基。二是从20世纪40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励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融入群众,创作出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家中的赵树理、孙犁、贺绿汀、丁玲、周立波,等等,都创作出了堪称一代革命经典的文艺作品。这一时期的经典作品衍生自“五四”一代的经典,在深入劳动民众和结合革命实践上做出了杰出探索。三是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这无疑又是一个广泛接受西方经典影响的新经典生产时期,同样涌现出了一批优秀作品。这些经典反映了时代革新的渴望,虽然文学史尚未确定地从这一时期筛选出代表性作品,但我个人以为那个时代也是创造经典的时代则是毋庸置疑的。

21世纪,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提出及其进程的推进,必然要求文化与文艺的伟大复兴,必然要求新的文艺经典的涌现。经典的产生需要时代为其提供契机,也需要作家、艺术家们有更大的作为。文艺经典的历史告诉我们,作家首先要“向下看”,要对基层情感、诉求和疾苦有深切的体验,并准确把握基层劳

动者对于未来的期待,确立起民间底蕴;其次,要对传统经典的意义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重探与发掘,让经典点燃思想,确立起价值和理念的文化底蕴;再次,要树立起文艺创作上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以“戏比天大”的敬业精神和“十年磨一剑”的坚韧意志来从事写作,为时代立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确立起创造传世精品强烈意识。

从当前文艺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总在发掘着文艺作品的娱乐性和一次性消费价值,网络文学和“肥皂剧”的快速发展与膨胀已发誓要将快餐文学进行到底。一些写实性作品只着重写实,既缺乏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又欠缺性格和风格上的多样性、深刻性与审美性。传统经典精神在这个时代的文学“写手”那里常常是被解构,而非被建构的;常常是被戏谑调侃的,而非充满敬意的。传统经典在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一些读者欣赏趣味的下滑和不少创作者耐心的极端弱化——观察缺乏耐心,思考缺乏耐心,叙述缺乏耐心,炼意、炼字缺乏耐心……缺乏耐心是消费主义的密友,但却是精品力作的天敌。

现实生活、物质生存的沉重感和压迫感,使更多的人喜欢轻松愉悦的业余生活和精神生存,这是无可厚非的。文艺内涵的历史真实和崇高价值虽不可否认,但它们在业余时间给生活着的人们带来的往往仍是沉重感,甚至悲怆感;而戏说历史、解构崇高的作品则常常带给人们更多的轻松快乐。这或许是历史虚无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倾向在特定范围内也有一定读者基础的原因。人们消费作品就像消费食品,他们吃了食品,往往不会再考虑它们在肠胃里的存在;读者或观众看完作品后,一般也不太愿意再去思考,除了正派的或不正派的评论家,人们大多也不会去关心切作品带给人们的兴趣、影响和意味。有人学称,“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而现实的情景常常是:重读的人群正在不断消失,即便他们手捧的是经典。对于一部分作家来说,读者的趣味就是他们写作的方向,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他们码字所要遵从的原则。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在一些作家那里异化为卖者和买者的关系,读者(或观众)就是上帝——这条颠扑不破的商业法则,一定范围内也似乎成了创作领域的金科玉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经典重探将对当前创作带来挑战。经典都是负有使命的。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

上,经典往往是在作家、艺术家思想的巨大变革中涌现出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讲话》发生直接而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17年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的10年,都是人们思想的巨大震荡期和变革期,作家、艺术家思想活跃,承担责任的意识鲜明,以文艺作品为历史发展开辟道路的欲望强烈。民族复兴既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还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加快,一场发生于中国大地上的新的文艺复兴必将来临,这又将是一个经典涌现的时代,将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方面和重要体现。

经典重探应着重于经典对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构建。经典作为精神产品的存在,其核心或根本的基质在于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经典虽是作家、艺术家个人的创造,但它日后成为经典,则是历代广大读者选择的结果。所以,经典的价值观取向应该是与广大读者的价值取向相呼应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民族经典对于民族价值取向的确立具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于一个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言,经典的存在就是其文明的标识,没有经典就没有文明。重探经典就是对文明的核心——民族传统价值观的重探。复兴文艺,就是复兴一种(或一系列)对于民族精神存续具有底蕴意义的价值观取向;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复兴的内核是人文主义价值观一样。

经典重探还应着重于人的建设。经典是人的创造,也显示着人的理性和精神发展的高度与成熟程度。同时,经典也影响人、创造人。一部经典往往会影响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成长。因此,重探经典还应当关注经典育人、经典立人的方面。时代前进需要怎样的人,社会进步呼唤怎样的人,我们应该从经典中获取更多的启示。人应该怎样生存,走向崇高,还是走向粗鄙;是追求精神的独立,还是陷入物欲的深渊?传统经典都曾给予过深刻的回答。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站在经典的高峰之上,我们会看得更远、更清晰。

当前文艺创作上的消费主义倾向,使文化和思想流失严重,使人的精神面貌脆弱而苍白。我们的时代显然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给文艺补充更多的钙质,滋养人的心灵,强壮人的精神。而实现这一文艺使命,以蓬勃的时代精神重探经典、重释传统,将使当前文艺创作面临新的挑战。当然,这个挑战之后,将由新的经典来书写文艺存续的新的合法性。我们有理由期待着。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研究者对传统文化的把握能力,如坚实的文献学基础,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对此项工作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研究者对当代社会的认识,尤其是对当代社会关注问题的具体了解和深入研究,对当代人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的同情之关怀,也很重要。甚至在其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研究者能否发现问题、能否既准确把握又深刻地发掘、阐释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世界传播也是如此,只了解自己的文化,不了解传播所在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闭门造车,盲目推出,无论如何都是一厢情愿而已,甫一出口,也可能就成为他国文化博物馆里的标本了。而这当然不是传播者的初衷。

文学传统的当代弘扬

年初,由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从平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当代散文创作研讨会”在湖南举行。30多位与会文友以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为中心,从散文创作理论、当代散文创作的发展、新世纪散文创作现状、散文创作的情感、境界、散文的诗意以及个体的生命体验等多方面展开交流讨论。随后,《生命的意义——刘克邦〈自然抵达〉评论集》(余三定编,湘潭大学出版社)在2014年6月出版了。

收入这部评论集中的40多篇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全面、立体、深入地解读、分析、研究了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笔者认为,如下几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其一,肯定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具有“生命”的意义和精神。雷达《生命的意义》一文指出:刘克邦的“散文不属于精致灵性式的表达,也不属文化类的大散文。刘克邦的散文,重视人的现世生活,具有对现实感情和现实精神的深切关怀,所思所写都是艰难困苦的现实人,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努力奋斗,自强不息,层层突围,寻求快乐与幸福之源”。在雷达看来,“生命”、“现世生活”、“现实感情”、“现实精神”就是刘克邦散文的灵魂。周明《传达人间的温暖与爱心》一文认为:“这部散文集传达了人间的三个情:亲情、乡情、友情,是人间温暖、爱心的东西,传达的是正能量。他写的很多东西,都是他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遇到的,听到的,直接接触到他的,很平凡的事。平凡里面见真情,见人间真情、亲情、乡情里面的一些东西,很感人,挺打动人。”王宗仁《生活是至高无上的权威》一文说:“这是一本有‘我’的散文,全书61篇散文,每篇都是作者经历的真实生活,真实故事,真实思想。”“有‘我’的散文”是对刘克邦散文神韵的精准概括。

其二,肯定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具有“自然”的美学风貌。石英《刘克邦散文印象》一文指出:“刘克邦的这本散文集,命名为‘自然抵达’。顾名思义,是让自己对散文基本的追求,自然到达希望彼岸。自然,不是不用心,不是随意为之,而是从他文本中表达的中心意思,真实,自然,不挖空心思,不矫揉弄弄,而是他笔下的文字,反映出一个个真实的自己,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生。尽管这只是广大人生中的一个侧面,浩茫大洋中的一簇簇浪花,但整个集子令我读后,从总体感觉上看,他已经到达了终极目标的一段重要的里程。”贺绍俊《没有难度的难度》一文,对刘克邦散文“自然”的美学特点做了进一步的

阐述:刘克邦“专门取名为‘自然抵达’,也许是要告诉读者,书中的散文都是自然抵达的结果。自然抵达,这是一种生存姿态,也是一种审美选择,顺其自然,让自己的性情自然表达,自然倾诉,不矫情,不做作,也不渲染,不粉饰。《自然抵达》中的散文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文字,刘克邦就是在这样的文字中袒露胸襟,而读者则从这样的文字里读到了一个真实可爱的作者。”白桦《平朴的意味》、罗维《平朴的意味》、余春晖《“50后”群体人格的自然抵达》、宁新路《真情流淌的心灵泉水》等文亦是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相类似的观点。

其三,肯定刘克邦散文集《自然抵达》具有“文简”的语言表述特色。龚耀光《人朴文简谓真美》一文,既从文学的角度、也从哲学的视界对刘克邦散文在语言表述上的“简约”、“朴拙”的风格和特点作出了很好的分析:“东方哲学的心法大概不外乎这八个字:大道至简,返璞归真。”“老庄有‘见素抱朴’之说,佛法有‘禪寂’之美,日本文化中也有称为‘Wabi-sabi’(侘寂)的朴拙美学”。对于朴素与简约的追求,成为了古老与时尚交汇的哲学观念和生存状态。”“读刘克邦的散文,那种由文字带来的朴实感总是扑面而来的。”王山《文学作品拼的是胆识》一文,从刘克邦“非专业作家”的身份、角色出发分析了其散文语言“质朴”的特色,文中写道:刘克邦“不像那些专业作家要写一个什么名,只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一种对生活的体验,一种专业领域里的思考,率性写作,不吐不快。而且在表达的过程中,非常质朴,非常真实,非常的接地气。”夏义生《抵达人性的彼岸》一文则着重分析刘克邦散文形成“文简”的语言表述特色的内在缘由,文中写道:刘克邦“没有矫情没有伪饰,他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情感喜恶都在他的文字里。”“只有真诚的心才能够制作、创造质朴的文,质朴源于真诚,质朴是对文字游戏,是对华丽修饰,是对雕字琢句的纠正。”许旭文《精心剪裁,细密缝合》一文用“质朴大气”概括刘克邦散文语言的特征,文中写道:“刘克邦散文的情理与文辞的结合应该说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不仅有厚重丰富的内容,而且有独特的语言表述,质朴大气,老到绵厚,蕴藉幽默。”

我们看到,这些年来,我们社会“人为”的东西太多了,“设”的“法”太多了,折腾(瞎折腾)的东西太多了,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违背了“自然”、违背了“自然规律”。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非常希望,刘克邦执着追寻、并孜孜以求的“自然抵达”,能成为我们今天重要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发展观。

从平常生活中发现诗意

□余三定